

# 均衡发展 的政治逻辑

中国  
政治  
文明  
发展  
与  
建设  
丛书



林尚立 / 主编

胡位钧 / 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  
政治  
文明  
发展  
与  
建设  
丛书

# 均衡发展 的政治逻辑

林尚立 / 主编

胡位钧 / 著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均衡发展的政治逻辑/胡位钧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与建设)

ISBN 7-5366-7052-4

I. 均… II. 胡… III. 政治—研究—中国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093 号

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与建设丛书  
**均衡发展的政治逻辑**  
胡位钧 著

---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80 千 插页 2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

ISBN 7-5366-7052-4/D·373  
定价:16.00 元

## 作者简介

胡位钧，男。1969年生于武汉。199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受聘于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并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从事公共管理领域的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

## 总 序

理想与现实,是决定人类生活的两极,人类生活无时无刻不摇摆其中。人类生活是多方面的,包含着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对来说,主导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是现实的力量,而主导精神生活的则是理想的力量。政治生活要特别些,同时受到现实的力量和理想的力量主导。这与政治生活的特性密切相关。

政治生活的本质,就是人们基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通过共同营造的公共权力,来保障自身的权利和维护社会的秩序,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发展。所以,政治生活具有相当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受现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决定;另一方面又主动地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亚里士多德断定: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不过政治生活,不是神就是鬼。换句话讲,对人来说,政治生活是人现实存在的必然前提。政治生活的双重性,决定了政治生活,不仅要受到现实力量的主导,而且要受到理想力量的主导,因为,政治反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功能,使得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政治之上,期待通过改变政治生活,提高政治的水平,来促进现实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当然,除此之外,人们对权利的珍惜以及对权力的关注,也使得人们对政治天然抱有期待,即希望政治能够有效地保障或实现自身的权利要求,或能够亲身介入政治,直接掌握或分享权力。这种希望和期待的最基本取向,就是民主的追求。

任何政治生活都必然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发展与变化,人类的政治文明正是在这种发展中得以形成、丰富和延续的。所谓政治文

明,就是人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为建立公共秩序、推动社会进步而形成的用于调节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关系的价值规范、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总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力量,一方面来自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时也来自人们对政治发展的希望和期待。在这两方面力量作用下,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发展,首先必须立足现实,其次要超越现实。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无数经验表明,有效的政治发展,都应该是立足现实与超越现实的有机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二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包括政治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

近代以来,基于市场、资本和技术的力量而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浪潮把各国的发展日益纳入到全球发展的运行轨道。在这种发展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①</sup>。于是,追求这种“未来的景象”就成为不发达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在政治发展中,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这种“未来的景象”就是现代民主政治。于是,民主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然而,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在尚未找到通向民主化发展道路之前,民主化必然更多地作为理想的力量作用于现实的政治发展。伴随这种作用的往往是西方政治的制度、价值的绝对化,从而使这些国家因此将其简单地照搬照套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无数的经验事实证明,这种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不难,但是要取得成功很难,因为,要使外来的制度和价值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本身就非易事,更何况这种照搬照套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带来种种后遗症。于是,在追求民主化发展过程中,如何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实践有自己特色、符合具体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不发达国家民主化发展的关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06页。

中国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治发展始于近代。当中国力图通过变法来振兴国家的时候，建立现代民主就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追求。这种追求的首先发端就是引入西方的制度，定宪法，开议会，搞选举。然而，辛亥革命前后的所有努力，不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都没有使这些制度在中国真正扎根，并解救中国。但是，辛亥革命所留下的民主共和的政治遗产，使中国真正走向了民主共和的道路，其最大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在相当长时间里照搬苏联的模式，没有有效地处理好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果，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和实践遇到挫折，受到破坏，并因此导致“文革”。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以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人民民主和建立法制、推行法治为目标的新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在总体是成功的，它不仅有效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而且有效保障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整体发展。

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由于时代、国情以及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原因，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相互促进，稳定发展的时间不多，最集中的体现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全方面变革与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有序而稳定的政治是任何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显然，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不仅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而且也是中国通过政治的有效作用来保障与推进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发展。只有同时看到这两方面的政治发展，人们才能深刻理解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建设 with 政治发展。

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追求的基本目标。这个目标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理想性。理想性体现

为它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寄托着民众与社会的无限期望;现实性体现为它在中国要成为现实,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而且需要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中国政治的具体发展来说,这个基本目标的理想性和现实性都直接转化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压力:目标的理想性,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快速推进;而目标的现实性,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循序渐进,于是,如何平衡政治发展的这两个内在取向,就成为有效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这种平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战略框架,它由三个层面构成:第一层面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者协调发展;第二层面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有机统一;第三层面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在这个平衡框架下,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推行法治以深化民主、变革体制以巩固制度、增量改革以保持活力、扩大协商以增强整合的渐进的政治发展道路。这种渐进的政治发展,在积极追求民主化的理想与目标的同时,时刻把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机互动,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有效空间与根本动力,从而使自身的发展不仅能够沿着理想的目标前进,而且通够有效地保障与推进改革与社会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及其成果的实际成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稳定、有序和持续的政治发展,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成长。所以,当人们力图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时候,就不得不从中国政治渐进发展的逻辑去理解和分析中国发展的成就。

然而,中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并没有导致中国政治的保守性,相反,渐进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更为有效的现实经济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激发了中国政治发展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决心和动力,为此,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发展目标。建设政治文明这一目标与任务的提出,全面提升了中国政治发展,使



其在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机互动中,更加理性、开放和包容,进而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带入到人类政治文明的殿堂。

和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一样,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没有摆脱理想力量和现实力量的交互作用,但是,中国政治发展在经历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摇摆之后,最终还是找到了能够有效平衡理想与现实两大力量作用的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发展目标:即以渐进有效的政治发展,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从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足以证明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显然,这种研究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其中自然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宏观的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从历史的逻辑出发;中观的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从现实的逻辑出发;而微观的研究,则可能更多的是从对象的逻辑出发。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中一个重要历史环节,要对这个历史环节的运动规律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这个历史环节在整个现代化历史运动中的价值和意义,自然从中观层面研究更为合适。这种认识构成了本丛书选题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决定了本丛书的总体风格:即不直接从政治发展本身的逻辑入手,而是从政治发展重要因素的现实考察入手,通过这些要素的研究来学术性地展现有中国特有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文明建设实践。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使命和运动规律,是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使命,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这套丛书的学术努力,不仅有现实的关怀,还有学术的关怀。尽管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这种关怀是无限的。如果我们的这种关怀能够给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带来一些新的理论和学术元素,那么我们的努力也就有了自己的意义。

林尚立

# 目 录

<b>总 序</b>	.....	(1)
<b>绪 论</b>	政治是国民财富的灵魂 .....	(1)
<b>第一章</b>	发展怪圈: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困境 .....	(19)
	一、“问题累积式发展”的悖论 .....	(20)
	1. 政治系统的后发劣势 .....	(22)
	2. 秩序的乌托邦 .....	(30)
	二、失序还是失衡:案例研究 .....	(38)
	1. 伊朗“白色革命” .....	(38)
	2. 阿根廷“第二次革命” .....	(46)
	三、两次“革命”的反思:一个事关均衡的问题 .....	(54)
<b>第二章</b>	短缺社会: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	(63)
	一、停滞的农业与农业社会 .....	(64)
	1. 生产工具的“考古学” .....	(65)
	2. 畸形发展的横向比较与纵向延伸 .....	(70)
	二、失落的工业现代化 .....	(74)
	1. 比较视野下的近代工业 .....	(75)
	2. 1949—1978年:赶超与倒退 .....	(79)
	三、发展的辩证法:第一次否定 .....	(88)
	1. 国情的再认识 .....	(89)

	2. 虚幻的均衡:非洲早期道路检讨 .....	(93)
<b>第三章</b>	<b>梯度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成长 .....</b>	<b>(99)</b>
	一、不平衡增长:理论透视 .....	(99)
	二、梯度发展战略的历史逻辑 .....	(104)
	1. 利益分立实现农业积累 .....	(105)
	2. 梯度模式向城市经济扩展 .....	(112)
	3. 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格局 .....	(118)
	三、梯度效应:经济成就的检视 .....	(126)
	1. 发展数据的考量 .....	(127)
	2. 现代化指标的测度 .....	(132)
<b>第四章</b>	<b>优势磨损:梯度发展的非均衡性后果 .....</b>	<b>(137)</b>
	一、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分化 .....	(138)
	1. “总体性社会”及其治理空间 .....	(138)
	2. 社会分化:以阶层分化为例 .....	(143)
	二、中国:趋于失衡的现代化 .....	(147)
	1. 发展不平衡的货币考察 .....	(147)
	2. 失衡:从财富到权利 .....	(156)
	三、非均衡社会的政治危机:以印度为例 .....	(163)
	1. “两个”印度 .....	(164)
	2. 被撕裂的政党、政治和国家 .....	(171)
<b>第五章</b>	<b>战略转型:均衡发展的政治基础 .....</b>	<b>(179)</b>
	一、发展的辩证法:第二次否定 .....	(180)
	1. 梯度发展物质基础的自否定 .....	(181)
	2. 梯度发展制度基础的自否定 .....	(184)
	二、均衡发展战略的萌蘖 .....	(186)
	1. 统筹发展:科学发展观 .....	(187)
	2. 均衡发展的政治先决条件:与统筹相契合的公 共资源汲取能力 .....	(191)

3.均衡发展的政治系统建设:与统筹相契合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 .....	(196)
三、结论:走出现代化的发展怪圈 .....	(201)
<b>引用书目</b> .....	(211)
<b>后 记</b> .....	(215)

## 政治是国民财富的灵魂

18世纪的中西分流，标志着地球上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从此走上了盛衰不同的发展轨迹：在此之前，虽彼此隔绝，却大体相当；在此之后，两者渐行渐远，终成天壤之别。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最终相会时，欧洲人看到的不再是想象中的“极为神奇的中国”，而是一个他们认为“停滞的”帝国、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幼稚的”民族、一个在未来数十年里大家一致同意给予“教训”的“半野蛮人”、一个不进则退、重又堕落回野蛮和贫困状态的可悲民族；昔日曾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日已风干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sup>①</sup>。这场经济形态的“分流”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走向，其影响之重大、意义之深远、启示之深刻，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必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 1750年的中西分流

在当今史学看来，划分“历史分水岭”的做法无异于裁剪历史，以反历史的方式对待历史，使“历史的真实”湮没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抽象命题中。这话说得有理，只是在一般的层面上谈论中国历史，还是有必要对1840年鸦片战争的政治转折、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社会转

<sup>①</sup> [法]阿兰·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2版，第566—567页。

折、1905年废除科举的文化转折给予特别的关注。史学家们倾向于将1750年前后,视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尽管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NP依然位居欧洲和日本之前,1820年中国的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达到日本的5.28倍<sup>①</sup>,但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分流的格局初露端倪。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细致地描绘了这个历史的分水岭:“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此之前,在能够进行计量比较的范围内,欧洲与东亚主要经济区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和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sup>②</sup>。对比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和英格兰、尼德兰等经济核心区域,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1800年以前的西欧在资产积蓄方面存在着数量上的优势,在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生产技术手段、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生态资源储备等方面,西欧也不存在能使其获得决定性优势的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由于煤铁生产、纺织品生产和航海业的发展,通常被看做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先兆,因此,这几个方面的数据以及农业发展水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首先,农业是19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欧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就粮食的生产和流通而言,1750年前后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将更为系统和优良的耕作技术投入田间,由此获得的农产量远远高于欧洲同期水平:此时山东省的人口均数大约是每平方公里约250人——无需净输入食物供养,其生活水平领先于欧洲,大致与西欧相媲美,而每平方公里约100人的尼德兰,却需要输入大量食物以供接济;与此同时,大约

① [美]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② [美]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2页。

还有3 000万石粮食进入远距离贸易流通,粮食的流通量超过1800年前欧洲粮食远距离贸易峰值5倍以上,是全盛时期波罗的海地区正常年份粮食贸易量的20倍。

其次,在非农业生产领域,中国与西欧也是各有短长:煤、铁和纺织品的生产一直被看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但是,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煤铁综合生产体系,采矿、冶金、焦炭的生产和使用领先于欧洲数个世纪,1700年欧洲(俄国除外)铁产量的总和甚至赶不上中国1080年前后的产量,尽管这一先锋部门在蒙元入侵和各种自然灾害的打击下逐渐丧失了优势,经济和人口重心南迁又使煤铁生产远离中国北部和西部的煤矿资源,但是,1600年中国的铁产量还是达到了至少45 000吨的新高度,生产技术方面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在纺织业中,中国使用的纺织机器与珍妮纺纱机和凯的飞梭技术含量相同,只是在某一个零件上略有差异,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是当时中国和欧洲纺织品生产力最高的两个地区,据推算,长江三角洲的纺织品人均产量是14.5磅棉织物和2.0磅丝织物,1800年纺织技术革命业已起步的英格兰,棉、毛和亚麻产量的总和不过是人均12.9磅,而此时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几乎双倍于英国。

最后,在产权、劳动力和自由市场制度方面,18世纪的中国比西欧更符合新古典主义的有效经济制度理论:中国各地超过93%的土地或多或少都可以自由转让,土地租赁也极为普遍;在高度商业化和比较富裕的长江流域,大约有45%的土地被出租,华东南的一些地方甚至高于这一比例。与之相比,英格兰和西班牙限定继承权的地产在西欧土地中所占比例,远远大于中国不能进入市场的土地比例:直至19世纪,英格兰全部土地中仍有约50%的土地由聚居的家族占有,土地买卖缺乏基础并受到严格限制,18世纪法国的习俗规定和法律手续,使排干沼泽、灌溉农田、推广农业技术和生产经验几乎无法实行<sup>①</sup>。

<sup>①</sup> 数据来源:[美]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总之,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的主要经济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的发展中,存在着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欧洲的物质资本并没有累积到具有决定性优势的地步,欧洲的“机械本质主义”并不代表技术进步的惟一方向,欧洲面临的“马尔萨斯束缚”并不比中国更少,遭受的制度性障碍却比中国更多。欧洲与中国都在向着“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发展——在这条道路上,“即使有稳定增加的劳动力投入、已知最好的生产方法的传播和能够使分工更为有效的商业化的发展,产量也只是勉强领先于人口的增长”<sup>①</sup>。

彭慕兰认为,西欧核心地区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能够成为19世纪新世界经济的特权中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供养飞速发展的人口,“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sup>②</sup>。布罗代尔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即“美洲是关键的关键”。正是美洲殖民和海外的原始积累,使西欧得以摆脱生态制约并幸运地获得传统发展模式的“断裂”:依靠美洲新大陆的资源输入,英国的煤产量在1815年至1900年间增长了14倍,糖和棉花的同期输入量分别增长了11倍和20倍;大量的短缺资源从美洲输入,大批的过剩人口向美洲输出,西欧避免了以劳动密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工业化”由此发端;同时,“西欧为开发和持久征服而做的组织改革,以及把企业形式和强烈的高压统治结合起来的制度改革——加上由从美洲印第安人易受天花创伤到新大陆白银的巨额供给,以及中国重新确定通货本位的同样巨大的工程,这所有事件构成的有利的全球性关联——使它们获得了巨大的优势。”<sup>③</sup>这些优势促成了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而中国则由于没有这份“偶然发现了意外财富的运气”,于

① 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194页。

② 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278页。

③ 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267页。



是在沦为世界边缘的路上渐行渐远，一切都变得不合时宜，并因此而显得处处不利。

当然，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西欧的幸运在于它的幸运只是一个开端，而中国的不幸却在于这种不幸将持续百年。此后的中西历史为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观念增添了新的外延，在一个以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为主导的全球等级区域联合体中，“经济秩序的砝码变得越来越重：经济指导、干扰和影响其他秩序。经济的优势使不平衡现象更趋加剧，使同一经济世界中的伙伴停留在或穷或富的地位，似乎角色一旦分配完毕，便要延续很长时间。”<sup>①</sup>也就是说，多中心的世界格局作为一种“不成熟的”形态正面临变革，国际劳动分工在消除一切地域隔阂的同时，以其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制造着地域对立的“伤口”，“这里出现的至少有三块‘场地’，分属三种类型：一个狭小的中心，一些相当发达的次等地区，最后是广大的外围地带。只要从一个区域转入另一个区域，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秩序势必跟着发生质的变化。”<sup>②</sup>在这场划分世界中心与边缘的经济牌局中，谁能拿到了比别人更好的牌，就意味着谁能获得“反复和接连遇到的机会”，而此后的历史分野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对于富国来说，“富国富，正是因为已经富”，因为它已卷入到有利于发达的运动之中；而“穷国穷，就是因为穷”，因为它预先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sup>③</sup>。

国运犹如天命，梦醒时分，往往大势已去。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三联书店1993年4月第1版，第34页。

②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三联书店1993年4月第1版，第23页。

③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三联书店1993年4月第1版，第37页。